

在追求自由民主中認識 耶穌基督

洪予健

我來自中國大陸，屬於生在紅旗下，又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知識分子。回顧自己的心路歷程：從追隨共產主義，到對其徹底的拋棄；從信奉民主，科學萬能到接受耶穌基督為個人的救主；前後一共經歷了三個階段。

新中國的青少年

我們從小就被告知：生活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青少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代，同時又肩負着神聖的歷史使命，那就是要解放全人類，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。關於共產主義，那是一個消除了剝削、壓迫，人們要啥有啥的人間天堂。無數的革命先烈為這崇高的理想已在我們的前頭光

榮地犧牲了。在舉國上下衆口一詞的歌頌聲中，我和當時千千萬萬的天真孩子一樣，被眼前描繪的美好圖景所吸引，理所當然地接受了這種來自最高權威的灌輸。

年齡稍大點，只聽革命故事當然不能滿足自己的求知欲。於是黨又適時地把馬克思、列寧、毛澤東的著作擺到了我的面前。好傢伙！一看書名，我這個當時只具初中文化程度的小青年，不由得馬上肅然起敬：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及三個組成部分、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。這些書據說都是人類最先進的知識結晶。而馬克思的最大功績，則是發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，將空想的共產主義——這個人類古老的夢想，奠定在科學的基礎上。提到科學，誰敢反對？所謂科學，就是對客觀事物相互間關係的正確描述或抽象。譬如說，社會主義必取代資本主義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中的一條科學定律，就如同電學中的歐姆定律一樣，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。既然無產階級革命是社會進化的必然過程，我若與此為敵，那豈不是愚不可及？

遭到批判

可是怎料到，我這個自以為從理性的高度來追求共產主義真理的人，只因為在文革中說了幾句“不合時宜”的心裏話，竟遭到了批判。

依據馬列經典，我自覺沒錯；可黨依據權力，判你是打着紅旗反紅旗。我愈辯解，罪行就愈大。爲了求得過關，我只得作出“深刻”檢查，在屈辱與虛偽中苟生偷活。我痛苦、絕望，其狀比那些不信共產主義的人更可憐。最初的懷疑無可避免地發生了：共產黨人搞的馬列主義，真是科學嗎？如果說馬列主義是科學，則人人皆可追求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。可馬克思又公然申明，該科學有其鮮明的階級性，只能爲無產階級服務。誰是無產階級？是當時在鄉下務農的我？還是那些住洋房坐轎車的黨官們？我飢渴的心靈在黑暗中摸索，五官警覺地搜尋着外部世界的信息。

追求自由、民主

隨着文革後改革開放的到來，我接觸到了一些西方的出版品，特別是奧地利哲學家卡爾·波普的作品《開放社會及其敵人》，以其無懈可擊的邏輯分析，揭去了披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上的真理外衣。代之而起的民主、自由、人權、法治的新觀念，像是一股透徹清涼的甘泉，沁入了我久旱的心田。我要掙脫極權控制，取得言論與思想的自由。

一九八五年我赴美求學，這個願望終於實現了。可是這並沒有減少我對祖國前途與同胞命運的關切。相反的，

由於親眼目睹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成就和自由經濟的繁榮，我觸景生情，更哀嘆祖國與人民的不幸。民主與科學，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兩大標誌，我國早在五四運動時，就已竭力宣揚。可如今科學成了統治者的專利品，而民主則被扣上資產階級的帽子一腳踢出了國門。這是中國人民的耻辱。我們要繼承五四精神，掀起新的啟蒙運動，以拯救民族。這是我的信念，也是我的行動。我在讀書所在地的中國留學生中，鼓吹自由民主的思想，並多次聯絡同學，參加全美留學生的公開信簽名活動。

自由民主不能醫百病

當震驚世界的八九民運，遭到血腥鎮壓後，我悲憤交加。除了積極地參與組織集會、遊行等抗議活動外，更出席主持舉辦了一系列的“六、四”研討會，期望總結八九民運的教訓，及深入一步地討論有關中國前途問題。研討會是一個自由講壇，既請各地知名人士到會演講，也請當地關心民運的朋友們商討切磋。在某次研討會上，正當大家就怎樣在中國，推進民主政治這一問題上，爭得面紅耳赤之際，有人唱了個反調：“嗨，都是吃飽了，撐的。民主這玩意兒有甚麼用？我看美國這民主社會，就不怎麼的。”此語一出，我心頭為之一震。是啊！我們花了很多精力和時間，探討如何去爭取民主的事，卻都沒有想清楚